

试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诗歌

于志鹏

(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 古人著书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明显体现, 这促成了史学的大发展, 并表现出文人兼综文史的特点。由此, 晋代史学在诸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以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来看, 诗人的创作常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 诗人还借用史家手笔歌咏史事, 体现出史学意识。

关键词: 晋代诗歌; 史学; 史学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4-0548-04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 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 大量文人因为兼综文史被社会所认同, 他们既是史家记史, 又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 大多有文集行世。这既促成了对史家文学才能的关注, 也使晋代史学在诸多方面对文学产生深刻影响。以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来看, 因其诗言志的传统, 诗人的创作常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 诗人还借用史家手笔歌咏史事, 体现出史学意识。所以本文试以晋代诗歌为代表, 分析史学影响下的晋代文学发展状况。

一

晋代史学受到高度重视, 已经逐步由原来文史不分的情况向独立学科的方向发展。从目录学看, 西晋荀勖著《中经新簿》, 确立四部分类法, “一曰甲部, 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 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 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 有诗赋、图赞、《汲冢书》。”^{[1](906)}东晋李充著《四部书目》, 又以五经为甲部, 史记为乙部, 诸子为丙部, 诗赋为丁部。此时经史分立, 史学地位在不断提高, 由西晋时的丙部上升到乙部, 也大体上奠定了后世史部位次。

东汉以后文人著述风气渐盛, 魏晋时更为显著, 文人著文以求不朽的意识在晋代得到体现。王隐认为: “古人遭时, 则以功达其道; 不遇, 则以言达其才。……

了无闻, 皆由无所述作也。”^{[2](2142)}当面对祸福无常、战乱频仍的社会现状时, 晋人表现出强烈的史学意识。通过修史可以抒其蕴藉, 还可以名垂千古, 所以当时士人不仅入史馆官修史书, 而且还大量从事于私人修史。《晋书·王隐传》记载其父, “少好学, 有著述之志, 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2](2142)}并提到, “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 而生长东南, 不知中朝事, 数访于隐, 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 所闻渐广。”^{[2](2143)}《南史》记载何法盛之所以以窃取手段夺取郗绍所作《晋中兴书》, 就是仰慕如袁宏、干宝之徒, 赖有著述, 流声于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提到: “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 私家得撰写史书, 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 因之, 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 唐时尚存正史体史(纪传体)八家, 编年体史十一家, 除陆机是西晋人, 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3](420)}

晋代文学的发展和史学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文士而兼史家的现象众多, 时人重视史家的文学才华, 当时的许多文士正是凭借文学才华跻身于史林, 参与著述, 如《晋书·郭璞传》记载郭璞“著《江赋》, 其辞甚伟, 为世所称。后复作《南郊赋》, 帝见而嘉之, 以为著作佐郎。”^{[2](1901)}《史通·史官建制》云: “旧事, 佐郎职知博采, 正郎资以草传, 如正、佐有失, 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 学综文史, 虽居他官, 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 而仍领著作郎者。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 江左之王隐、虞

收稿日期: 2007-11-27; 修回日期: 2008-01-16

作者简介: 于志鹏(1975-), 男, 山西大同人, 山东经济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预、干宝、孙盛，……”^{[4](400)}这样的现状使得晋代史学和文学的发展相互联结。一方面，修史要求史家善于驾驭材料，善于叙述事件，注意语言的表述，史家的文笔成为人们评价其史才高下的标准。《晋书·王隐传》提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2](2143)}对王隐著述的评价说明史家的文字功底非常重要。作为史家，袁山松也谈到：“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4](303)}对史家的文笔要求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晋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带上史学的影子。如傅玄既为史家也著有《傅子》一书，“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2](1323)}张华名重一世，除佐著作郎，“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伦。……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2](1074)}干宝既以才器召为著作郎，而且也以史的手法写出了《搜神记》这样的小说，被誉为鬼之董狐。《晋书·虞溥传》记载：“(溥)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子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2](2141)}《晋书·左思传》记载左思作《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又向张载访问蜀吴之事，坚持“依本”“征实”的态度，“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5](174)}可以看出，当时文士与史家联系频繁，史家的博物洽闻，有益于文学创作，左思精研细核的精神正可看做史学意识对文人的影响。在《三都赋》写成后，不仅皇甫谧为之作序，中书著作郎张载、中书郎刘逵为之训诂，司空张华也见而感叹左思可以出入于班张之流，这样的扬誉促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晋书·职官志》记载：“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2](735)}这既是对史家才能进行考验的过程，也表明晋代对人物传记的重视，促成了中国文学园地里传记文学的发展。

一

诗歌与史学的关系是历代文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要而言之，古人认为那些直抒胸臆、感怀激烈的诗作堪称诗史。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曰：“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作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怀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6](170)}就晋代来看，史学的发展使得文士的史学意识高涨，当他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方面借用诗的形式去抒写现实，诗人的创作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另一方面，诗人多采用史家叙事手法，发表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或受纪传体影响，多歌咏历史人物。

针对某些重大事件文士们常写诗称颂。洪顺隆《六朝建国史诗试论》中提到郊庙歌辞体裁以叙事为主，多叙建国事迹，目的在歌功颂德，用于祭祀饮宴歌舞，称得上是建国史诗。从傅玄留存诗歌来看，这类乐府诗占比例较大，泰始年间奉命制礼作乐，作五组乐歌：《晋郊祀歌》五首、《晋天地郊明堂歌》五首、《晋宗庙歌》十一首、《晋四厢乐歌》三首、《晋鼓吹曲》二十二首。其中，《晋书·乐志》记载《晋鼓吹曲》二十二首的写作背景，“及武帝受禅，乃令傅玄制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2](702)}这部分作品基本上是由古辞改造扩充而成。如果把这些歌辞连缀起来，就是歌颂司马氏三代创业代魏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的英雄史诗。再如张华的《晋四厢乐歌》十六篇、《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也是以古题乐府来抒写大晋文治武功。这些诗歌虽不无谀词，但从题目以及内容上可以看出当时朝代更迭以及晋代统治者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决策和收效。所以《晋书·乐志》提到：“改《雍离》为《时运多难》，言宣帝致讨吴方，有征无战也。改《战城南》为《景龙飞》，言景帝克明威教，赏顺夷逆，隆无疆，崇洪基也。……改《圣人出》为《仲春振旅》，言大晋申文武之教，畋猎以时也。”^{[2](702)}

其他如元康六年关中平乱，帝命诸臣作关中诗，潘岳“奉诏竭愚作诗一篇”(《上〈关中诗〉表》)，以典雅雅丽的四言诗写成《关中诗》十六章，诗歌首先交代战争缘由：“于皇时晋，受命既固。三祖在天，圣皇绍祚。德博化光，刑简枉错。微火不戒，延我宝库。蠢尔戎狄，狡焉思肆。虞我国眚，窥我利器。岳牧虑殊，威怀理二。将无专策，兵不素肄。”《晋书·惠帝纪》载：“(元康五年)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

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是岁，荆、扬、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诏遣御史巡行振贷。……五月，荆、扬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师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张损死之。……关中饥，大疫。”^{[2](94)}国家武库失火、兵器不足、遭水灾饱受饥馑之患、赵王伦施行暴政，与雍州刺史不和，作者用有限的文字描述的正是对这些史实的真实再现，尤其是诗歌接着以大篇幅写战争的苦难，最后简短归结讽天子诏作贺诗的举动，歌民生之苦，劝体恤百姓。从整体风格看以议论行文，寓主观评价于客观叙述之中，堪称大手笔。

晋代诗人也借诗反映当时文人雅集宴游的生活。《晋书·贾充传》附“谧好学，有才思。……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晔、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起为秘书监，掌国史。”^{[2](1173)}贾谧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时人追捧，围绕在贾谧身边形成的二十四友，虽然称不上是真正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参与者大多在文坛享有盛誉，创作了大量诗歌，许多诗歌反映出当时文人雅集的情况。例如关于陆机入洛以及预于二十四友，《晋书》记载张华为之延誉，我们读潘岳用四言写成的《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可以了解晋建国的赫赫武功以及延誉文人的虔诚。陆机《答贾谧》诗的序言也记载，“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诗答之云尔。”二十四友于贾谧座中辨讲《汉书》，并写诗以记其盛，如潘岳作《于贾谧坐讲汉书诗》，“治道在儒，宏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摘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唯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此诗写鲁侯贾谧的史才与识才，陆机《讲汉书诗》所写情形：“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活画出当时集宴辨讲的热闹场景。这些和《晋书》所记二十四友内容吻合，如《晋书·左思传》提到贾谧开馆延宾，左思曾经讲《汉书》。

晋代文人不仅以诗笔歌功颂德，或借诗情写时事，也在咏史诗中以纪传手法抒写人世感喟。以班固的传体咏史诗为代表，已经奠定了咏史诗基本的写作范式，即铺陈史传中人、事并加以咏叹，多寓借鉴意义。晋

代咏史诗诗人大多延续这一范式，并且在语言的表述上力避华美，而以质朴见长。如张载身为著作郎，生性闲雅，曾作《七哀诗》咏史，以平实语言正面叙述汉陵被毁盗的让人惨痛的情景，所述皆为史实，《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8](2327)}《三国志·魏书》卷二也提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9](81)}卢谡《览古》诗以五言概括了蔺相如的主要业绩：

赵氏有和璧，天下无不传。秦人来求市，厥价徒空言。与之将见卖，不与恐致患。简才备行李，图令国命全。蔺生在下位，缪子称其贤。奉辞驰出境，伏轼径入关。秦王御殿坐，赵使拥节前。挥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连城既伪往，荆玉亦真还。爰在渑池会，二主剋交欢。昭襄欲负力，相如折其端。眦血下沾衿，怒发上冲冠。西缶终双击，东瑟不只弹。拾生岂不易？处死诚独难。稜威章台颠，彊御亦不干。屈节邯郸中，俛首忽回轩。廉公何为者？负荆谢厥愆。智勇盖当代，弛张使我叹。

这可以看做蔺相如的诗体传，取材全从《史记》本传出，仅将本传改为韵体。傅玄的《惟汉行》《秋胡行》《秦女休行》等也是以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描述其生平遭际，情节细致生动。我们以《秦女休行》为例：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千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恍：“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今仇身以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法，义不苟活隳旧章。”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其本事见于《后汉书·列女传》，载：“酒泉庞涪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仇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已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馀年不能得。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

表其间。^{〔8〕(2796)}《三国志》、皇甫谧《列女传》亦有记载。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史书注重叙事的简明和真实性、完备性,而傅玄的诗歌在叙事的完备上不输史乘,并且结合对话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诗末予以评价,使得它的借鉴意义类似于史乘。

总体看,这类诗作的结构比较固定,即专咏一人、一事,在叙述史实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加以议论,有“史”有“咏”。但诗人的着力之处不在于抒情或议论,表达对史实的独到见解,而在于对既定史实的重新表述,客观色彩比较浓厚。明陆时雍《诗镜总论》评傅玄《秦女休行》:“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10〕(1404)}

随着文体意识的自觉,咏史诗的中心逐渐由咏人、事转到戒鉴讽诵为主,诗人延续纪传手法,也在诗中糅合自己对史实的看法,甚至进而引入对现实的认识,这样的创作观在史学发展中史论部分的加强也能体现出来,可以说是文士立言以不朽思想在不同文体中的体现。这以左思咏史八首为代表,借前史而自鸣不平。如《咏史》其一(弱冠弄柔翰)前八句写自己文才武略,后八句写自己“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表明建功立业并非贪图爵赏。其三(吾希段干木)歌颂段干木和鲁仲连有功于国而轻爵的品质,并借以表明自己的志向,“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其七(主父宦不达)借慨

叹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等人的困顿,慨叹“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说明自古以来奇才埋没草野,自己怀才不遇亦然。

综上所述,晋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使得当时的文坛宿将不论是否身兼史家,都能在繁复和华靡的创作风气中开出一条以叙事为主,叙议结合的路子,以文笔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不论在创作观念还是内容、体式等方面都体现出史学的影响,而正是史学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的发展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魏征,令狐德棻.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四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4] 刘知几. 史通笺注[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 [5] 萧统.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6]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卷十八)[C]//续修四库全书 139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7] 陈延杰. 诗品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8] 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9]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0] 陆时雍. 诗镜总论[C]//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O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poetry in Jin Dynasty

YU Zhipeng

(College of Arts,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Jin Dynast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moted that of Literature. Poets can be a creative playing concept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to the effect. Historians also borrowed poet singing reverberates history, reflected awareness of history in the language, materials handling, specific expression and showed that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Key words: history; poet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编辑: 苏慧]